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
青年成长基金项目

20世纪儒学发展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儒学发展研究/徐庆文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0. 8

(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项目文库)

ISBN 978 - 7 - 5329 - 3356 - 3

I. ①20… II. ①徐… III. ①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①B222.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7913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 sdpress. com. 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 com. 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40 × 203 毫米 32 开 印张/10. 125 千字/229
定 价	25. 00 元

.....
导 言



自孔子开创儒学以来，由汉武帝时期将其定为一家独尊后，在继起的两千年古代社会中，虽有朝代更迭、帝王替换，而儒学独享或分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地位却并无多大改变。然而，20 世纪仅仅百年时间，儒学的地位却经历了升降沉浮而难以确定。儒学不但失去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地位，而且被当做旧（封建）的意识形态和中国落后的文化根源被批判。整个 20 世纪，儒学经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的挫折，迫使儒家文化生机收敛，但其根系未死，活力犹存。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涤荡，从某种意义上成就了现代新儒家对儒学命脉的延续；“文化大革命”对儒学的批判，虽一度造成儒学传统断裂，但经过一段沉寂反思，儒学又在 20 世纪最后二十年中逢春沾雨，萌芽抽枝，得到学者们乃至全社会的重新关注。

儒学在社会中一家独尊地位受到公开挑战始于 19 世纪中期。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的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知识分子们从“天朝大国”的梦境中惊醒，开始反思中国文化问题。整个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尽管认识到乾嘉考据学的琐碎，也意识到传统儒学与现代科学的隔阂，但他们仍然对儒学抱有相当大的期望，不愿意放弃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导地位，一再强调儒学是“体”，西方文化是“用”。所以，知识分子们建议朝廷进行改良，“师夷长技”、民主立宪等

曾经是近代中国政治的潮流,然而,西方文化不断浸润,儒学对于社会发展的窒碍因素逐渐显现,知识分子对于儒学的批评也越来越多。

20 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的矛盾愈加突出,救亡图存成为举国的第一要义。这种形势下,晚清政府不得不废除科举,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然而,这一切已经无法改变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强面前被动挨打的局面。于是,知识分子们对政府的救亡图存举措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他们寄托于推翻清政府,另立新王朝。在这一背景下,知识分子们纷纷走上革命的道路,开始他们救亡图存的实践。1911 年辛亥革命后,建立起了共和制的北洋政府。然而,北洋政府标榜“共和”,实际相当于晚清政府的翻版。北洋政府的一系列施政措施引起知识分子们的极大反感,而政府试图建立孔教的行为令知识分子们大跌眼镜。于是,反北洋政府的呼声日益高涨。终于演变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儒学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标志着知识分子作为独立的力量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建设之中。知识分子由于反抗北洋政府而波及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使儒学彻底失去了成为一家独尊地位的可能。

对于中国文化建设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是“破”,即破除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然而,究竟怎样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解决。期间,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建设的各种见解,分歧不断,争议连连。知识分子在众多层面对中国文化建构的论争中,自由主义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新儒家三大思潮占据着主导地位,构成三足鼎立之势。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三大思潮相互攻击、批评。自由主义西化派们视东西之异乃新旧之别,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移植意识,全盘否定本土传统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号召与一切传统进行彻底决裂,重新打造人间天堂。现代新儒家

们相信，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生命脉所在，是拯救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因之他们为儒统的延续使出浑身解数。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结束了北洋政府军阀混战的局势，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建立新文化的希望。然而，国民政府的主张和行为仍然令知识分子们大失所望。国民政府拉来孔子作招牌，要求人们对孔子继续崇敬乃至跪拜。特别是戴季陶以曲解的手法将孙中山孔子化，将三民主义儒学化，从而使儒学不仅重新获得合法的地位，而且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相结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成为中华民国的立国之本。对于国民政府利用儒学进行的统治宣传，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起而反对。他们主要针对蒋介石的尊孔主张，系统地揭示孔子的思想，指出孔子思想只是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儒家的理论系统“是封建制度的极完整的支配理论”^①，“孔子是从上古社会到汉以后社会的一个枢纽，是封建社会的圣人”^②。正当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对儒学的批判时，抗日战争爆发。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御外来的横暴侵略，国民党、共产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来振奋军民的精神、意志，以反抗侵略。儒家伦理砥砺德行、变移风气、鼓舞士气、增益爱国心和树立自信心的功能，使其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抗战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尽管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争论与冲突，但在民族精神的复兴与重建这一点上，几乎各派学者都有相当一致的基本共识。他们都在竭尽自己的智慧与能力，从理论、学术层面证立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抵抗精神和热爱和平的根本特

① 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② 嵇文甫：《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见《嵇文甫文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页。

性,从而重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学者建立起了“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理论体系,确立了儒学哲学化的形而上学建构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占据了理论的“话语权”,三大思潮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争论在中国内地结束。由于中国共产党在50年代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研究和批判儒学,使得50年代至70年代近三十年时间里儒学研究方法单一,教条化严重。这个时期儒学研究成果不少,争论的场面也非常热闹,但有价值的东西不多。而“文化大革命”时期又演了一出闹剧。“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些批判孔孟之道的文章的学术水平可想而知,它们除了一些政治性的宣泄外,很少有客观的研究和扎实的学术功底,因而其学术上的价值几乎等于零。”^①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儒学研究也开拓了新局面。随着中国内地的开放,文化的多元取向逐步打破一元独尊的沉闷,民族文化和儒家思想逐步受到重视,优秀传统得到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弘扬,直至融入国家内外政策之中,构成了20世纪儒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世纪的儒学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传统与未来的重要课题。目前,研究儒家文化的学人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整个20世纪的儒学发展脉络正在进行反省和思考,对于儒学的价值和命运及其在近现代的升降沉浮正在进

^① 庞朴、马勇、刘貽群编:《先秦儒家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行各种诠释,由此取得的科研成果,已经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但是,20 世纪儒学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自近代以后,儒学的命运与社会现状、政治组合、民族盛衰、国家兴亡已经杂糅在一起,难解难分。本课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与方法。在翔实、全面掌握 20 世纪儒学发展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有价值的学术资料后,对于儒学在 20 世纪发展的历史进行逻辑分析和总结,力求做到客观、平实、辩证、全面地把握 20 世纪儒学的基本面貌和走向。

诚然,20 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世纪,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理论基础的世纪,儒学发展面对着许多史无前例的新情况。加之旧世纪刚刚结束不久,中国文化和儒学发展所遭遇的问题还没有完全显现,如何评说 20 世纪儒学发展尚无令人信服的定论,许多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不休。这都为如何把握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历史增加了难度。更由于本人才疏学浅,把握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的学术发展,确实是勉为其难,其中一定存在不少叙述错漏或不到位的地方,甚至还有低级错误,留待弥补。

目 录

导言	01
----------	----

第 1 章

“独尊”地位的消解——19 世纪后半期儒学的嬗变	01
一、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及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01
二、鸦片战争对儒学的冲击	08
三、农民革命思潮的鞭挞儒学	11
四、改良维新思潮的改铸孔子	14

第 2 章

辛亥革命前后反孔与尊孔的对峙	21
一、革命民主思潮的排孔无圣	21
二、政府更替与儒学重塑	27
三、孔教运动对儒家的合法性重建	34
四、儒学是什么？——民国初期关于儒学的争论	47

第 3 章

破与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儒学	54
一、新文化运动与激进学者对儒学的批判	54
二、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方文化论战	67
三、新文化运动与三大思潮	76

第 4 章

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拒斥儒学	87
一、自由主义西化思潮的渊源	87
二、自由主义西化思潮的儒学观	89
三、自由主义西化派与儒学的发展	102

第 5 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儒学	115
一、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儒学观	115
二、时代的使命与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	121

第 6 章

返本与开新:现代新儒家的复兴儒学	143
一、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	143
二、现代新儒家的崛起	149
三、现代新儒家对文化传统的维护	161

第 7 章

断裂与传承:20 世纪后半期儒学发展的曲折路途(上)...	172
一、20 世纪 60 年代关于儒学的论争	172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儒学研究的断裂	195
三、港台现代新儒家对儒学的坚守	202

第 8 章

断裂与传承:20 世纪后半期儒学发展的曲折路途(下) ...	220
一、20 世纪 80 年代儒学研究的新启蒙	221
二、20 世纪 90 年代儒学研究的转向	249

第 9 章

走向 21 世纪的儒学	272
一、经学解体与儒学的现代转换——20 世纪儒学存在状态 的变迁之一	272
二、政治化儒学的消解与多元化儒学的兴起——20 世纪儒 学存在状态的变迁之二	283
三、21 世纪儒学发展前瞻	293
后记	310

第 1 章

“独尊”地位的消解

——19 世纪后半期儒学的嬗变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自西汉被定位于“独尊”后，直至清代，其独享或分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地位始终没有根本改变。然而，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之后，儒学的存在状态受到了来自内外各方面的冲击，儒家文化与近代社会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儒学的“独尊”地位受到质疑，儒家思想与主流的意识形态之间出现了裂痕。

一、晚清今文经学的兴起及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刘师培认为，“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明儒直而愚，清儒智而谄。明儒尊而乔，清儒弃而湿。”^①说明了清代之儒学与明代的区别。

进入清代以后，儒学发生了变化。由于清代是满族人统治，汉人（尤其是汉族的学者们）往往采取一种对朝廷的消极抵抗态度。清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经有意识地提倡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并有意识地提拔了一大批理学名臣，企图以理学来消

^①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59 页。

弥汉族知识分子对异族统治者的敌视。但是,汉族知识分子不仅不接受朝廷的笼络,反而激起他们反清的民族气节。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反抗,只能表现在思想上。于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从学理上对满清王朝依傍的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并采取一种与理学相反的治学方法,从正名开始,考证儒家经典中一些重要概念,并进行新的分析,附加新的意义,以期借学术来鼓励人们反对异族统治。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清初的思想家们企图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发掘中国文化的精髓,重建中国文化的新体系。于是,遥承两汉学术旨趣的“汉学”路线的乾嘉学术系统逐渐形成并兴盛,影响了整个清代的学术。

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而且考据是治学的基本功。无论是汉唐时期的经学,还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均建立在考据学的基础之上。考据学虽然是治学的基本功,但它不是学术的主旨和全部。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使考据和学问之间等同起来。乾嘉学派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顾炎武被公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先河,其后有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之分。在吴派和皖派两大系统之外,还有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及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这些学派均以考证实证为基本特征,被通称为乾嘉之学。乾嘉学派之所以重考据,一方面可能是学术旨趣的原因,更大的一方面是对异族入侵的反抗。这种反抗,与其说是学理上的歧义,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分歧。因此,乾嘉学派在学理上依傍考据轻视义理的偏颇也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在乾嘉学派内部,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

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皖派则重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其特点是从音韵、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乾嘉学派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脱离实际、厚古薄今、舍本求末、烦琐细碎等的严重缺点，其结果在细枝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儒学与时代课题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的恶果。

乾嘉学派原本是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经世致用学说的延续，其目的在于改变理学的空谈性质，借以反抗清廷所依傍的理学。然而自乾嘉汉学形成之日起，由于过分注重考据，也由于知识分子对于世俗层面的清高，它的“经世致用”的方面反而逐渐变淡，“经世”的成分越来越少了。除了个别学者如戴震还能保持怀疑、批判的精神外，绝大多数的乾嘉学者已慢慢地蜕化为保守的学者。他们在音韵、文字、训诂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凡古儒所误解者，无不旁征曲喻，而其本义之所在，使古圣贤见之，必解颐曰：‘吾言固如是。’数千年误解之，今得明矣！”^①乾嘉学派的这种考据功夫无疑为后辈学子研读古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然而从学问的建树来说，乾嘉汉学的考据学流于纤巧与琐碎，舍本而逐末，使学术成为逃避现实的掩护所。在考据学的支配下，知识分子纷纷钻在象牙塔里讨生活，钻到古代典籍里而不问现实。儒学的经世

① 阮元：《螭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0页。

致用的功效一点点地丧失了。于是,思想界内部对这种烦琐的考据出现了不满的声音。有的学者开始批判乾嘉考据学派脱离现实、回避现实。如章学诚就认为,考据学者“舍今而学古”,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事实上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好古之弊,是欺人之术。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昧于知时,动辄博古”(《文史通义》),不计其学术之实用,故而其学问再大,也不过是供贵族们玩赏的游戏而已。

检讨、反省乾嘉学派最有影响的当属常州学派。常州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以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为代表的,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派。由于他们都是清代常州府人,因此得名。如乾嘉学派一样,常州学派开始也是以汉学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但是他们推崇的是《春秋》,尤其是《春秋公羊传》。这无疑是对当时经学研究一尊东汉古文经,重视训诂名物,以字解经学风的反动。在历史上,《春秋》经孔子删削后,出现过几部阐释经义的传。今存的《左传》(《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和《穀梁传》(《穀梁春秋》)合称“春秋三传”。《左传》重于史实传述,《穀梁传》、《公羊传》偏重于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公羊传》相传为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公羊高是子夏的学生,最初只是口口相传。汉景帝时,其玄孙公羊寿始与学生齐人胡毋子著录而成书。《公羊春秋》专门为解释《春秋》而作,内容虽疏于史实的记载,却详于“春秋大义”的阐说,因而,对于理解《春秋》字义,了解先秦的名物制度和典章礼仪很有价值。常州学者的《公羊》学研究,虽与吴派、皖派乃至稍后的扬州学派本质上仍属于汉学的一部分。但今文经学的兴起却使儒学重新回到经世致用的路途中来。常州学派的开山者庄存与、刘逢禄等人在研究《春秋》时抛却今古文的界限,呼唤宋明理学的重振。庄存与的《春秋正辞》、《公羊春秋何氏释例》等著作以宋明理学解释儒学传统,专求所谓微言大义,但期融

通圣奥，归诸至当。庄存与虽与戴震是同时代人，治学途径却截然不同，他“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①庄存与认为《春秋》寓寄了孔子的经世法则，其中每一字每一句均寓意深刻、关乎治乱，所以阐明《春秋》大义应是经世治用的第一要务。“庄存与独具慧眼，第一个发现了埋藏于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的今文经学的开发利用价值，治之于举世不为之时，的确难能可贵。”^②

然而，庄存与对乾嘉汉学的反叛，仍然属于学术范畴，且与当时讲论“或柄凿不相入”，在当时学界的影响不大。到了刘逢禄，常州学派才真正以《公羊》学为旗帜正式建立。刘逢禄著有《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左氏春秋考证》等，他以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对《公羊》学的研究结论为宗旨，以笃守董、何之学为正途，着意发挥《春秋》之微言大义。他认为“《春秋》文成数万，其旨数千，天道浹，人事备，以之贯群经，无往不得其源；以之断史，可以决天下之疑；以之持身治世，则先王之道可复也。”于是，刘逢禄寻其条贯，正其统纪，使《公羊》学与现实政治、社会变革相结合。刘逢禄有感于清朝的衰败，格外重视《春秋公羊》“绌周王鲁”、“受命改制”之义，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克服内忧外患。刘逢禄关于《公羊春秋》学的研究成果，实为清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使当时学者逐步摆脱乾嘉考据学的束缚而另外开辟学术道路。宋翔凤是常州学派的又一代代表人物，他是庄存与的外孙，幼从舅父庄述祖受业，颇得常州学派之旨。后就学于段玉裁之门，兼通训诂和考证。他治经发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把儒学解释成神学，并喜附

① 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② 吕明灼、王钧林、张佩国、权锡鉴：《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7—38页。

会，常杂以谶纬神秘之词，以言圣王大义。在庄存与、刘逢禄等人的先后影响下，《公羊》学成为当时异军突起的学问，许多学者都以治《公羊》学成为名家。而经过常州学派对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的阐发，晚清儒学逐渐舍弃了乾嘉时期专门从事繁琐考证，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倾向，重新回到了经世致用的传统。

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奠定了今文经学复兴的基础，但是他们的微言大义仍停留于义理层面，因而，今文经学实际上还停留在纯学术的领域。真正超越学术，从思想上光大《公羊》学，并给整个社会以震撼的还是龚自珍^①。龚自珍为段玉裁的外孙，十二岁即从段玉裁受训诂之学。后拜刘逢禄、宋翔凤为师，专治《公羊春秋》。在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清政府的统治已摇摇欲坠，而外国的势力又接踵而来。在这种形势下，龚自珍以《公羊》义理探讨如何摆脱社会危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龚自珍曾抨击清政府专制统治造成“万马齐喑”局面，要求“更法”，认为“一祖之法无不敝”，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转移。他猛烈抨击乾嘉考据学为琐碎的无用之物，是脱离社会实际的有闲阶级的学问，于社会实际生活无补，并力倡经世致用之学，提出“道”、“学”、“治”三者不可分割，“经”、“子”皆史，超越今古文的门户之见。他认为汉代学者也并不是不言性道，宋代学者也不是不言名物训诂，乾嘉诸老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实在是以偏概全，以此去解说汉代儒者的学术精神，恐怕汉儒也不会接受。在他看来，真正的或者说传统的儒家学说不外乎尊德性、道问学两大端而已。如果以为儒家之学仅尽于名物训诂，则是以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

^① 一般情况下，龚自珍与魏源都归结为近代的启蒙思想者，实质上龚自珍的思想成熟于鸦片战争以前。

也。他怒斥当时的儒者把“衰世”说成“治世”，以自欺欺人，粉饰太平，麻痹百姓。龚自珍的思想给当时中国思想界很大影响。梁启超认为：“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①

有了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对今文经学的提倡，有了龚自珍对今文经学的超越，今文经学开始在晚清复兴。今文经学复兴的重要人物是皮锡瑞和廖平。皮锡瑞认为，治经要旨有六条，“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以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清儒学案》卷一九三）皮锡瑞指出，《易》、《礼》为孔子所作，五经虽大部分是古代已有的篇籍，但经孔子整理后，使其包含特有的“微言大义”，始成为“经”。廖平的经学虽以善变著称，然而，他尊孔宗经却始终如一。廖平称自己的学问以辨析今古见长，他早期的《今古学考》认为《王制》是今文经学的根本，今文以孔子为宗主；《周礼》是古文经学的根本，古文以周公为宗主。其后，廖平又改变前说，提出“尊今抑古”，认为今文是孔子的真学，传孔子的微言大义；古文为西汉刘歆之伪作，尊六艺必黜古学。戊戌变法前后，廖平又自驳，认为今文是小统，古文为大统。“一大一小，一内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于经学中开此无疆之世界。”（《三变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